

第一章 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发端

第一节 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前提

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在其传统社会制度的遗产基础上起步的，因此，我们考察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应首先探讨日本现代化的社会前提。

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

在现代化以前，日本是亚洲东部落后的封建岛国。日本进入现代化社会，是其传统社会发展演变的连续过程。明治维新后现代化的选择“只有立足于过去日本的遗产之上才有可能。”^①这是因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日本封建社会的特点，被称之为“幕藩体制”社会，这种体制不仅构成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出现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扶植农业的政策。当时是以人工灌溉的稻作农业为主，据统计，到 19 世纪 60 年代，德川幕府修筑的大型水利工程有 81 项。由于修筑水利工程，大量沼泽地变为良田。德川初期，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约为 163 万町步；德川中期已达到 297 万町步，农田开发取得了显著成绩。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 页。

日本发明了锋利的备中锹，是一种有四个齿的镐，广泛地适用于深翻土地、开垦荒地和耕耘水田。普遍使用了踏车灌溉、千齿脱粒器、唐箕簸谷和水车碾米等高技能的农具。这些农业生产技术的问世，表明了粮食生产从播种到收获已经出现系列的机械化，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肥料逐渐多样化，除使用杂草、稻秸、树叶等绿肥作为水稻底肥外，还开始使用粪肥、豆饼和干鱼粉供水稻追肥，或用于菜田和棉田。

商品性农业有了发展。在德川幕府时期，大名和武士都集居在领地内的城市中。由于实行交替参觐制度，各大名还需在江户设有官邸，统治阶级的城市生活，刺激了领主经济商品化的进程，商业性农业有了迅速发展。有些地区为出售而种植棉花、烟草、油菜、大豆和养蚕，城市近郊种植蔬菜。伴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分工，逐渐取代自给自足经济的趋势。到幕府末期，就日本全国范围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一些先进地区，农民已经开始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同商品生产的联系日益密切。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①日本农业经济开始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手工业的兴起。进入 18 世纪，日本蚕丝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由京都的西阵扩展到关东的桐生、奥羽的福岛、近畿的丹后等地。福岛的信达丝业分化为养蚕、制丝和丝织三个部门。丝织业发达地带的下广泽村，全村 33 户从事丝织，富者拥有 12 台织机，穷者 1 台也没有，只好为人佣工。棉织业较发达的尾张西部，相当多的农户拥有 5、6 台织机 雇佣 10 名左右女工。到 19 世纪初叶，棉纺织业生产分化为纺纱、染色和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7 页。

织布专业。先进地区出现了农村手工工场。

德川幕府末期，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诸如酿酒、榨油、造纸、采矿、冶炼、铸造、陶瓷和水产加工部门，都出现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这些城乡手工工场的出台，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但是，由于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和对内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国际和国内市场狭小，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19 世纪 40 年代，日本幕府和各藩迫于西方殖民国家的军事压力，开始采取西洋炮术的军事改革，自 50 年代以来，幕藩为增强国防战略出发，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产业技术，招聘外国技术人员，创办了制造火炮和洋枪的军事工业。1854 年萨摩藩军事工厂竣工，1857 年长州藩造船厂投产，1865 年幕府在法国援助下建立了横须贺铁工厂和造船厂。这些幕藩营军事工业引进西方先进的产业技术，移植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张力，成为日本社会变革的潜流。尽管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场还处于初期阶段，却产生积累效果，为日本社会发生激烈的变革开辟道路。

二、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

德川幕府后半期，日本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起初，它们作为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内部强大张力，如同潮水一样冲击着日本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短期内难以为人们所察觉，而时间长了便积累起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造成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致使封建社会的框架无法再容纳新的生产力的发展。

伴随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的发展，农业中经济作物的栽培盛行，商业性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大米为主的农产品商品化日趋显著。到 18 世纪中叶，不仅封建领主剥削来的贡米已经开始进入

流通领域，连农民自己剩余的农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迅速的增长。在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下，日本农村逐渐发生了阶级分化。农村商人、工场主和家庭手工业者，无视幕府禁止买卖和私人占有土地的禁令，将抵押过期的土地据为己有，或投资开垦新田，开始出现新兴地主富农阶层，史称“豪农”。例如，新泻县的市岛家、白势家都拥有 1000 多町步土地。这些豪农非封建领主而属于新型剥削形态，他们使用雇工经营富农经济，出现了剥削雇佣劳动力的萌芽，其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丧失土地的贫农，只好当雇工或从事他业谋生。在畿内摄津、河内以及和泉等地，贫农已达 50—70%。幕末的日本农村，除封建领主外，还出现了豪农；除自耕农、佃农外，还出现了雇农及农村无产者。

日本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都市化的趋势。早在 18 世纪，日本江户的规模可同伦敦相媲美，拥有 100 多万人，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大阪有 40 万人 京都有 3 万人。在都市崛起的过程中，大商业高利贷资本阶层开始形成，以大阪的三井家和鸿池家富豪为代表，成为享有特权的“御用商人”，其他商人组成行会“株仲間”，垄断产销特权。大批发商“问屋”、钱庄“两替屋”和大高利贷者“札差”，他们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逐渐操纵经济命脉，据统计，18 世纪末期全国财富的 5/6 已归商人，大名不得不依赖富商，当时流传着“大阪豪商一怒，天下大名惊恐”。一部分豪商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而绝大多数以禄米为收入的武士阶级，因不断减俸和生活费用上涨，经济上更加依赖豪商，致使下级武士的特权地位动摇。为此，部分下级武士迁怒于幕藩封建体制，甚至“恨主如仇敌”。下级武士由于接触西方文化，出现部分下级武士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有的则成为社会变革的政治精英。

18 世纪以来，日本的封建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社会正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走向解体，幕府财政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恐慌。德川幕府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政治极度腐败。担任幕府老中的田

沼意次是个政治腐败的上层代表。据《江都见闻录》记载：“田沼不仅见钱眼开，看到金银便可忘乎所以的人物，并且把下属行贿多少作为权衡手下人对其忠义深浅的标准。”^①后来松平定信担任幕府老中时，社会的贿赂风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宇下人语》中写道：把金子放在袖筒里，偷偷地行贿，那已是往事了，当今，行贿都用缀有黄金的小柜。听说田沼要营造别墅，各地诸侯、“旗本”更是争相进献木材、石料。到了中秋赏月之类的节日，也是绞尽脑汁，送上各种镶嵌金银的家具。纲纪松弛，政治腐败，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日本统治阶级的堕落标志着德川幕府的政治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德川幕府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了日本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

首先，是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新兴地主与幕府封建统治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资产阶级是伴随着这一新的经济关系而产生的，并“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的。”^②马克思曾经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③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终于开始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当然，由于幕末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尚处于它的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受到幕藩体制的限制和阻碍，把资产阶级引向投资于土地，使日本资产阶级的形态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他们中间有工场手工业

维新史料编纂事務局編：《維新史》第1卷，明治書院1940年版，第324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197頁。

资本家，也有“批发行资本家”，还有地主和资本家一身兼二任的“豪农”。豪农作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同幕藩体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政治上，豪农中间有些人成为领主阶级统治农村的基层官吏，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豪农整体来说，他们仍是处于封建领主统治下的被压迫阶级。幕藩对豪农实行种种的束缚，各藩实行的专卖制度束缚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幕藩禁止雇佣工人的法令，剥夺了他们经营工场手工业的自由。因此，作为资产阶级豪农要求废除各种封建性的限制，以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作为地主，他们要求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统治制度，使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豪农强烈要求改革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正是由于豪农具有上述的革命要求，当明治维新发生后，他们便慷慨解囊捐助，积极支持反对封建幕府的斗争。

其次，是封建领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主要对象。农民蒙受沉重的封建负担，农民不仅要向封建领主缴纳“五公五民（即收成的一半）六公四民”乃至“七公三民”的实物地租，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诸如家屋税、窗户税、布税、酒税以及幼女税等等。税往往预征若干年，其他种种形式的勒索用笔难书，德川幕府的统治逻辑，就是“捐税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位”。

德川幕府时期，多数农民丧失了世袭领种的土地，变成名为“小作人”的佃农。1816年出版的《世事见闻录》记载农村称为“上田”的土地，都已集中到富农手里，佃农终年拼死拼活地干活，但能吃到的却只是米屑、糠麸和稻秆等物。那些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室儿女的农户，就更是穷困不堪，即使倾家荡产，也抵不过欠下的债务，倘若是饥荒年景，佃农的处境更是悲惨。1832年至1836年间的“天保饥馑”时，饿死者不计其数，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农村各地杀婴盛行。

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激起了阶级斗争日益加剧，促使农民和市民铤而走险，据统计，从 1590 年至 1867 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达到 2809 次，平均每年约有 10 次。到幕府末期，农民起义出现了高潮。1865 至 1868 年间，农民起义多达 75 次，平均每年近 20 次。农民起义不仅次数越来越多，而且规模也超出了“藩阀”的范围。农民起义要求减免贡赋、反对苛捐杂税和改革官家恶政。同农民起义相呼应，城市贫民掀起了“捣毁”运动。1837 年，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市民暴动被镇压后，相继许多人自称“大盐门弟子”举行暴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成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

再次，是幕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本的武士以战为业，是幕府封建统治营垒的卫道士。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从封建领主手中领取的俸米。他们为封建领主服务，是靠封建伦理道德来维系他们同主人的关系，他们效忠主人的精神，甚至发展到剖腹殉主的地步。

封建武士阶级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特权。每一个武士成员，都握有对被统治者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就武士阶级的内部来说，各个阶层和集团政治地位并不相同。在上层武士之间，由于与德川家族关系的亲疏的程度不同而有“亲藩”、“谱代”和“外样”之分，他们的政治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存在着矛盾。在下级武士中间，直属将军的武士“旗本”和“御家人”的政治地位比较优越，可以参与幕政。在各藩里，只是少数高级门第的武士把持藩政，而广大的下级武士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因此，在上级武士与下级武士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冲击着武士阶级寄生生活的基础，对武士阶级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骑

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① 在幕末的日本，武士阶级的寄生生活是靠征收农民的贡米。他们都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城市，因此不得不将贡米出售，换成货币使用。这便使武士逐渐丧失了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能力，而陷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之下。封建大名们为了维持政务，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经常采取削减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少则三成，多则过半，从而加速了下级武士的贫困。由于为贫困所迫，有的武士出卖祖先传下来的武士佩刀，有的去经商，还有的则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售武士身分，其中不少人转化为资本家。到幕府末期，许多下级武士从封建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逐渐蜕变成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形成了倒幕派。

三、日本民族的现代化觉醒

日本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到 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后，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国家。为了保证封建专制的统治，幕府统治者出于防卫的需要，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1633 至 1639 年，德川幕府先后五次发出“锁国令”，建立起严密的“锁国”体制。从颁发“锁国令”起，直到 1853 年约 220 年间，日本把国家大门反锁，不仅一切外国人被逐出日本，而且禁止所有日本人出境，唯在长崎保留了一个小小的贸易基地，只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在严格的监视之下居留在那里，并许以有限的贸易权。使日本人了解世界的视线被遮挡了，日本处于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

日本封建统治者实行锁国的政治目的，是企图防止外国思想来搅扰日本的封建秩序，从而动摇自己的专制统治。在航海业不发达的时代，海洋是日本岛国的天然屏障。然而，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自 16 世纪起，西方国家的船只相继驶抵日本。最早 15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50 页。

年，葡萄牙的帆船首先冲进日本列岛，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也接踵而至。这些西方国家的船只来航日本，从此，开辟了海洋贸易的通道。

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是逆现代化发展潮流而动的，由于锁国的自我封闭，丧失了接触西方国家现代化物质文明的机遇，西方产业技术无法传入，严重妨碍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使日本人的思想陷入愚昧无知，窒息了日本民族积极进取的精神，阻碍了日本社会历史的发展。然而，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是历史时代的发展趋势，德川幕府无法抵挡。17世纪中期以后，伴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不久出现整个欧洲的产业革命，使人类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预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景。

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出台后，便迅速地向外扩展，向所有的封建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①西方国家的商船载着机器生产的商品、近代武器枪炮和西方的传教士进入日本后，长期蒙受封闭窒息的日本人，在同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接触中，他们打开了思想的天窗，扩大了社会视野，渴望了解西方世界。

日本国的现代化历史，如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不是起步于内部的自发因素，而是由于亡国灭种的外部威胁的惊醒。因此，实现全民族的团结，高扬国家意识，齐心协力抵御外侮，力争在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时间内国家崛起，就是民族现代化的觉醒，成为民族主义的精神旗帜。

日本民族，自公元 2 世纪以来，便不断地吸收近邻中国的古代文明。在日本社会融合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在日本列岛上形成了中国的边缘文明——日本文明，作为其重要内容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形成。所谓价值观念，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①价值观念，即是人们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评价其效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古代社会里，中日两国文明水准差距很大，日本一直移植中国文化来丰富自身的文明。具体来说，日本遣唐使在中国期间，他们把唐朝文明与日本的文化水准相比较，非常称赞唐朝高度的封建文化，极力主张汲取中国的先进文明，以改造日本的落后文化，终于导致了“大化革新”，使日本按照中国模式转向封建社会，实现了日本历史的飞跃进步。

日本移植中国文明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日本民族形成了认同外来文明的价值意识。这种价值观念，使日本人成为“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②当历史时代提供新的文明信息出现时，他们便会以敏锐的姿态，对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比较和选择，本着为我是用的原则，把新的文明拿来用于自身的发展，这种采用外国现成文明的意识，也称为功利现实的拿来主义价值观念。因此，“主动汲取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③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本应为人类社会所共享。任何民族其自身的发展能力都是有限的，它需要不断地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06 页。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 页。

同上书。

借助于其他民族创造的产品，来推动自身社会的进步。19世纪中期，当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袭来时，日本便迅速抓住社会变革的机遇，改革了尊崇对象，积极输入西方文明，从传统社会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社会价值观，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为当年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是无法阻挡的。18世纪前期，一些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透过“锁国”的帷幕，利用一切缝隙吸收从西方传来的文化，从而“兰学”悄然兴起。所谓兰学，是指由荷兰语书籍所介绍的有关医学、天文学等知识，其中也包括经由中国传来的天文、地理书籍所介绍的西方学术。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从荷兰语版翻译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于1774年问世，这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前野和杉田的弟子大槻创立了日本第一所兰学塾，称为芝兰堂。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长崎等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1809年日本开始组织洋书翻译，1855年建洋学所，1856年改为番书调所。1862年又改称开成所，专门讲授西洋地理、物理、化学、兵学等课程，培养了大批拥有西方科学知识的人才。日本民族开始触及到了西方文明时代跳动的脉搏，引发了日本民族现代化的觉醒。

日本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是经过学习文明物质表层的部分，到学习文明的内隐部分的深化的过程。18世纪中后期，日本还处于学习西方文明物质表层部分的阶段，如新井白石、山原蟠桃等人只承认西方科学技术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而在哲学方面还是日本原有的“儒学”优越于西方。到幕府末期，由于西方军舰炮火的轰击，他们省悟到了西方文明的深刻内涵，认识到学习西方制度的必要性，横井小楠在1860年撰写的《国是三论》中，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在墨（美）利坚，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曰，因天地间惨毒莫过于杀戮，故则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一曰，取智识于世界各国，以禅益治教育为务；一曰，全国大总统的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①日本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愿望。”

这是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认识上的飞跃。他们从倾慕西洋的“精湛技艺”到意欲探寻西方社会的内涵，认识到有效地使用科学技术，是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效能密切相关的。横井小楠认为英国战胜清朝，除因国富兵强外，还因实行了议会政治，统一了民心。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所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②这正是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和“霸府之权柄”营私的德川幕府所不及的。日本下级武士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逐渐肯定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

从兰学进入日本国，到明治维新前夕，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已经传播了一个多世纪。自 1747 年至 1852 年间，日本有 117 位学者翻译西方书籍，译书总数达 500 多部。日本被迫开港以后，有不少武士出身的青年，例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等人相继到西方学习，西方文明在日本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传播的社会效应，激起了日本民族的现代化觉醒。自大化革新以来，日本人长期处于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19 世纪中叶以后，经由西方现代化观念的启迪，日本有些学

《日本思想大系》第 55 卷，岩波书店 1971 年版，第 448 页。

中村尚美：《大隈重信》，吉川弘文馆 1964 年版，第 24 页。

《日本思想大系》第 55 卷，岩波书店 1971 年版，第 448 页。

者把西方的议会制度，用“民为邦本”的思想加以解释，倡导“顺民情”“从民意”的民本主义思想。1855年横井小楠提出了“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的主张，到1869年又提出“日本国中共和一致”的设想。这些主张反映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色彩。

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封建剥削，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止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商人置于士、农、工之下的地位，鼓吹经商为卑贱的思想。海保青陵撰文批判藐视尊贵的封建武士，他说“卖物并非耻辱之事，欠町人的债无力偿还才是最大的耻辱”，指出买卖交易是源于“固礼之法”。他主张鼓励民众开发水旱田，生产各种商业性产品，撤销各藩之间禁止商品流通的规定，实行藩与藩之间的自由贸易。

日本封建的幕藩体制，实行严格的身分等级制度，这不仅限制了社会人员的行动，而且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著名思想家司马江汉起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他说“天子和我们都是同样的人”，“上至天子、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人也”。洋学家福泽谕吉也积极反对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度，主张“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平等思想。他指出，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有很大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像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他痛斥封建权力观，宣传资产阶级契约学说，他认为，人是国家的主人，根据契约将国家事付托给政府去管理，政府应代表人民，按人民的意志去行事。

日本民族在批判封建制度中，深刻反省到自己历史上封建愚昧的危害，他们把学习西方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追求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来改造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这种弃旧图新的现代化意识，培养出一批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下级武士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既了解封建幕府的腐朽落后，又深

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正是由于用现代化思想武装起来的改革派领袖们，他们亲手制定出日本社会变革的决策，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把日本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引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四、日本“开国”、改革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学说告诉我们，世界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诞生的起点。以美洲的发现和往反非洲南端航线的开通为契机，世界市场得以进一步拓展，封建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市场需要，这就使封建的行会性的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进而向机械工业发展，由于这些经济的变革，引发了推翻封建统治的社会变革。于是，西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便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点。

国际现代社会的问世，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① 人类历史走向现代社会，就是在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相互交流中实现的。因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② 因此，社会的开放交流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障。

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是受中国的“华夷”思想的影响。德川幕府将中国儒家的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而中国的“华夷”思想就成为日本对外关系的指导观念。这种“华夷”思想为盲目排外的愚昧主义，是由自给自足的闭锁性经济所造成的思想。中国的“华夷”思想移植日本后，为德川幕府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宣扬所谓“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可自足”。“华夷”思想在日本发展得更加愚昧无知；虽然四海广大而国家众多，但无堪与本朝相比之国土，即使大唐，亦不如本朝之完美。”^①

19世纪4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势力为了开通全世界市场，西方列强利用现代化的军事武器，开始攻打远东封建锁国的中国和日本，企图占领这些最后的封建堡垒，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朝野上下的巨大震动。日本把清朝帝国的失败看作是“天赐前鉴”。幕末重臣胜海舟编著了《开国起源》一书，其中收集了有关中国鸦片战争的资料，他精心研究鸦片战争与日本的关系之后，胜海舟指出：“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②当时幕府老中水野忠邦也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1860年，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公开批评清朝统治者“骄傲文弱，不知海外各国已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仍把各国当作昔日夷狄，如禽兽般蔑视。以至道光末年鸦片之乱为英国所挫。”^③日本人鉴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既不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不了解世界形势，结果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因此，日本上下都主张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

1844年，荷兰军舰“帕兰邦”号驶入日本长崎港，海军上校科普斯给日本幕府带来了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亲笔信。信中通报“近来英国国王向中华帝国出兵而发生激战之情况”，提醒日本政府如果仍实行锁国，必将重蹈中国之覆辙，将遭受到如同中国的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胜海舟全集》第2卷，劲草书房1979年版，第499页。

见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灾害，竭力敦促日本迅速开国。

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很快传入日本，受到了日本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积极加以翻译、训解和评论。他们把《海国图志》视为了解世界形势的极好教材。日本学者大槻裨写道：“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乖错，变每出意测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夷情备采者，系清人魏默深刻《海国图志》中所辑。”^①学者广濑达说：“读其书以了解海外情势，不至于对外国人或轻视傲然，或恐惧害怕。”^②横井小楠也改变了锁国论的观点，1854年，他致友人的信中指出：“锁国非我祖宗之法，今日之事，开国均应以天理公道行之”，主张“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公理”，他批判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亦无大策，惟知空喊大和魂”这种传统的“顽冥固陋”，只能误国误民，毫无可取之处。吉田松阴通过学习《海国图志》，通晓了世界形势，结合日本的实际，他尖锐地批判了幕府的锁国政策。他指出：“锁国犹如一人被围，须留意前后，注视左右，昼夜不得安寝，每每终于气力松懈，而遭俘获。一时之战略虽可应付，然就长远而言，若始终仅仅竭尽财力于海岸之防守，则可致国贫民穷，大敌来犯时，其结果亦将与一人之被围者同。”^③引出结论是“闭关锁国，诚为失策”。他积极主张“振雄略察四夷”实行开国通商，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贸易，使日本走上富国的道路。

在开国舆论的推动下，德川幕府被迫制定开国的决策。德川幕府统治者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到应当“观察天之时运与

站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第 149 页。

同上书，第 33 页。

《吉田松阴全集》第 4 卷，岩波书店昭和 13 年，第 117 页。

世界之情势，^①要尽早抛弃抱残守缺的锁国观念，“如果继续闭关自守，整个国家就有可能遭到西方国家的围攻”，将会导致“日本的覆灭。”^② 1858年，幕府老中堀田正睦曾说：“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③ 佐久间象山身体力行研究新科学，要求学习“西方之法”。他虽承认西方社会制度有所长，但反对完全化若西方。他非常欣赏《海国图志》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著名论断，这里所说的“东洋道德”，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政治，而吸收“西洋艺术”是作为维护“东洋道德”的一种手段。正像佐久间象山所说：“合众国之政法 如何之善 于本邦则难以实行。”^④ 这种倡导“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与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相似，已从锁国攘夷论走向了开国论。

正当日本统治阶级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醒悟，构思应付西方国家的挑战，怎样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之际，美国海军舰队突然闯进日本国。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舰驶抵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他携带着美国总统的国书，以武力强制要求日本开国。德川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国书，并答应次年递交回信。1854年培理舰队再度来航日本，德川幕府面临国内开国舆论压力和美国舰队的威胁，意识到锁国攘夷已经是不可能的，不得不做出让步。日美双方代表在神奈川（横滨）举行了谈判，于1854年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亦称《日美神奈川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函馆两港；日本供应美国船只、煤、水、柴、粮食等必需品；美国船只在海上遇难时，日本要给予救护；允许

《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378页。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97页。

见《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61页。